

# 东方历史评论

历史的，批评的，审美的

ORIENTAL  
HISTORY  
REVIEW

许知远 主编      绿茶 执行主编



历史新声：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

# 东方历史评论

03

ORIENTAL  
HISTORY  
REVIEW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历史评论. 第3辑 / 许知远主编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95-4437-0

I. ①东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历史事件—世界 IV. ①K1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440号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[www.bbtpress.com](http://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出品人: 刘瑞琳

责任编辑: 孟凡礼

装帧设计: 陆智昌

制作: 杨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 276017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24 字数: 355千字 图片: 15幅

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编者的话

## 历史新声

“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：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其本国以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二、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三、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……”

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繁体的标题，里面是竖排的小字，有一种魏晋碑帖的味道，还有一种面对破碎山河时的顽强和信心，“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”；但是全书一点没有强词夺理的戾气，对于所述主旨，莫不从容不迫，一一列举理由，而且也时而看得见作者的顽皮，“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，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”。

那是1939年，钱穆先生四十岁出头，以研究先秦诸子成名的他，依照之前在各个大学任教时的笔记，写就了这本《国史大纲》。当时同在岩泉禅寺任教的更加年轻的张荫麟，以更流畅粹美的文笔开始写作他的《中国史纲》。在那本书的自序里，张荫麟直接宣称，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有机会，在“血泊和

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”。他说过去十年里我们发现的新史料，运用的新方法，已经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，而且将来的史学，一定是“万果垒垒”的。

他们当然有理由如此自信：梁启超、傅斯年、顾颉刚和胡适已经把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之路踏平了，剩下的就只有更年轻一辈在新学的广阔天地里面开拓。他们的师友中，也有王国维、柳诒徵、吕思勉、陈寅恪和陈垣这些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抱有同情的学人。他们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学府留学或是进行研究，张荫麟和另一位比他年龄稍长、名气却大得多的同辈学人，由治外交史而转向外交实务的蒋廷黻，都是留美归来。著有《清史大纲》的萧一山，三十岁上获得资助赴欧洲访学。最终，这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其各自专精的领域都有所成就，可是他们最出色也是最出名的作品，却往往是由讲课记录整理而来的通史，那里面有他们的雄心，你甚至从这些著作的名字就能感到这一点：除了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，张荫麟那未能完成的《中国史纲》，还有柳诒徵的《中国文化史》、吕思勉的《中国制度史》、蒋廷黻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；就连以断代考据擅场的陈寅恪，“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《中国通史》及《中国历史教训》”（俞大维语）。他们代表了一个锐思驰骋而又元气磅礴的时代。

这也是个迷人的时代。你不会忘记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下的断语，张荫麟优游不迫的叙述节奏，还有那一代历史学人考据的严谨、论辩的节制。这些三十年代的历史学者的作品在今天被重新发现，其中的一些几乎可以在不加注解的情况下就被当作教科书使用，反映了他们结论的可靠，而且，其中的大多数可以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，其中最好的那些则具有伟大的长篇小说的精神气质。在这些作品面前，翦伯赞和胡绳们实在太刻板也太激越了，有点像叛

逆期的倔强，像不那么好的类型小说。

年轻的民国造就了这些尚是青年的历史学者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，用胡适的话说，连皇帝都可以不要了，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。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“五四”，让当时一位对时局敏感的读书人感慨：“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，学问总是追赶不上。”他很快要以自己对古史的考辨，引发史学界的大地震。这些新文化、新主义的兴起给以旧法治学的儒者带来压力，也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对于经史关系的看法，拓展自身研究的范围。纵观民国的史家和史学，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里所说的“志气”。

如果说时代精神能够造就一代的史家，一代史家的著述也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真、细心地研读今天的历史学家的作品，不仅仅是为里面的知识学问，也为我们所处的当下确立坐标，为未来寻找方向。

我们在这里推出生于1970年之后的十五位青年历史学者，希望从他们的访谈和代表作里找寻这个时代的“志气”。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挑战，是让史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，成为近代的历史学，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则是摆脱阶级和革命史观的叙事，创造一个更新的，同时也还原一个曾经的历史学。

从与他们的对谈里我们感到希望：他们明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写作既有的局限，希望不仅从材料上，也从方法和思想上取得突破；他们努力吸收来自国外和前辈的新的视角和语汇，对于史学界和思想界的动态保持关注，也对自身提出了种种要求；在大众文化生产出的通俗历史写作的冲击下，他们也能够保持专业历史研究者客观、冷静的态度，容忍，有时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

播的进程中去。毕竟，9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、平等的治学环境；快速开放的中国，重新带给他们走出国门、和国外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；在这里面，也有并不依赖学院体制，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写出优秀作品的学者，虽然大学的校门依然对他们紧闭，但是公共空间和媒体在过去二十年的快速成长，给了他们空间和阵地。

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求真、求实的欲望：如果过去曾是被刻意扭曲、忽略的，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，用难以争辩的事实回击它。有了明确的手，挑选何种武器就变得特别容易了。因为曾经的历史叙事是基于对于历史材料的选择、过滤，在主题先行的前提下挑选历史证据，在价值判断已定的情况下展开议论，那么现在的历史就应该从对材料的全面审读出发，从事无巨细的检索、查找和整理开始，然后基于这些工作得出所谓“客观”的结论和判断。毋庸讳言，现行的学术出版体制也偏好事实性强的叙述，而对思想和价值判断有所保留。在这些背景下，对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，对于写作所谓“信史”的执著，成为了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偏好。

不过，求真的强烈欲望也可能使人掉入片面真相的陷阱。档案资料有几个层次的真实：最简单的是通过档案了解到之前鲜为人知或被故意遮蔽的事实；然后，我们可以了解创造这份档案的人的心智和情感，从而对这些具体的人和创建这些材料的具体制度有了认识；最后，我们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，有可能逐步进入当事人的心境，建立一种古今的连续感，把档案看作是一种活的传统，对于过去有一种带着历史感的认同。不过，如果阅读这些档案的目的是重估和修正，恐怕就不得不站在外面，就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的真实思考和写作。在目的明确、单向的求真过程中，今天的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似乎太急于放弃全景

式叙述了，因而丧失了对于历史事件起源、细节、丰富性的陈述能力，也无法经常看到他们个人色彩浓烈的一家之言。

矫枉过正的毛病，在思想和文化发生快速和剧烈转变的时候都有，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敏感者，也对此有所察觉。让人更加忧心的是，他们似乎对作为艺术的历史缺少基本的感觉。转变一种作为哲学的历史的最好办法，并非是用一种哲学来替换另一种哲学，用一种真实回击另一种真实，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刚从一口井里爬出来，就掉进旁边的一条沟里了；哲学的历史需要用艺术的历史来转化、瓦解、丰富进而重构。

缺少审美意识的历史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。倘若接触到用整齐漂亮的小楷写下的案牍、书信的时候，这些历史素材吸引人的并非是内容，而是有些黑字穿透了那薄如蝉翼的纸面，留下汉字轮廓形状的那一个个空格，你要从上下文里猜出这到底曾经是什么字。所谓历史事实也无非如此，存留下的档案只能留给后世的人一个轮廓，一个语境，确切的东西已经过去了，也可能已经丧失了。那种认为细心解释一套保存完好的档案就可以重构历史的想法，是以剥夺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为代价的。

有时我们觉得，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和体制下的青年历史学者，是不是过分苛责了？毕竟，从他们身处的纵坐标来看，世界范围的历史写作也呈现过度专业化，偏重研究而忽视写作，为服从学术体例而放弃个人风格的现象。历史感的构建，也非一人一日之功，而是需要人文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，以及博雅教育的普及。但是我们也害怕，如果他们误以为，一种研究方法的提升、一种手段的改变、一种求真的欲望就能产出好的作品，就能真正重塑我们的史观，就能够使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并驾齐驱的话，那么我



们就失败了，他们也许也会对自己失望。此时此刻，他们需要被提醒：历史写作“万果垒垒”的时代并没有到来，作为历史学者，他们需要比做好研究、写出信史和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强大的信念——这样一种信念，可能来自身为学人的道德责任，可能来自回望过去带来的历史使命感，也可能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定信心。简言之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 conviction historian，而不仅仅是 consensus historian。

这辑《东方历史评论》既非学术史，也不是排行榜，它无非是中国当代史学的某一侧影，不过却也包含了我们重塑史观的宏愿，还有对于这个时代精神气质的寄托。

- i 编者的话：历史新声
- 001 陈远：做学问是为解答自己的疑惑 采访：方可成  
013 院系调整中的燕京大学 撰文：陈远
- 025 沈巍：幽暗的史学 采访：肖海生  
031 戏梦台北：新编京剧中的政治隐喻 撰文：沈巍
- 047 崇明：回到近代自由主义传统 采访：杨潇、戴潍娜  
060 革命的终结——论孚雷的革命研究 撰文：崇明
- 079 冯筱才：重识历史经验的价值 采访：肖海生  
084 上海下层民众对“五四运动”的反应 撰文：冯筱才
- 103 付海晏：影射史学或集体的写作均不可取 采访：彭剑  
112 安世霖的悲剧：1946年白云观火烧案研究 撰文：付海晏
- 127 姜鹏：历史学者做通俗化工作从未间断 采访：方可成  
137 一个曹操，各自表述 撰文：姜鹏
- 143 李里峰：如果历史无用，则一切皆可曰无用 采访：方墨  
153 土改中的工作队 撰文：李里峰

- 167 梁志：寻根溯源，清算冷战的遗产 采访：邓志新
- 176 在反共、稳定和民主间权衡 撰文：梁志
- 191 马建标：在同情之理解中研究历史 采访：方曷
- 203 “不朽的家国梦”：五四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 撰文：马建标
- 217 唐小兵：重新认识知识人传统的历史谱系 采访：绿茶
- 227 重访中国革命：以德性为视角 撰文：唐小兵
- 241 肖清和：儒家基督徒身份认同下的两头蛇 采访：戴潍娜、杨潇
- 251 耶稣形象：明末清初西学东传的一个典型案例 撰文：肖清和
- 269 咎涛：这个时代的史学危机更严重 采访：励轩
- 279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“族史重构” 撰文：咎涛
- 295 丁三：情怀既立，观念自在其中 采访：肖海生
- 301 滇缅公路的修筑 撰文：丁三
- 311 张宏杰：中国史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采访：张天潘
- 321 一个绅士家族的经济成长：以湘乡曾氏为例 撰文：张宏杰
- 337 朱浒：在衰变的年代里 采访：戴潍娜、杨潇
- 348 整体性话语与地方性实践 撰文：朱浒
- 359 百年中国，薪火六代 撰文：谢志浩
- 368 二战一代的历史学家 撰文：威廉·帕尔默 翻译：方曷 朱丽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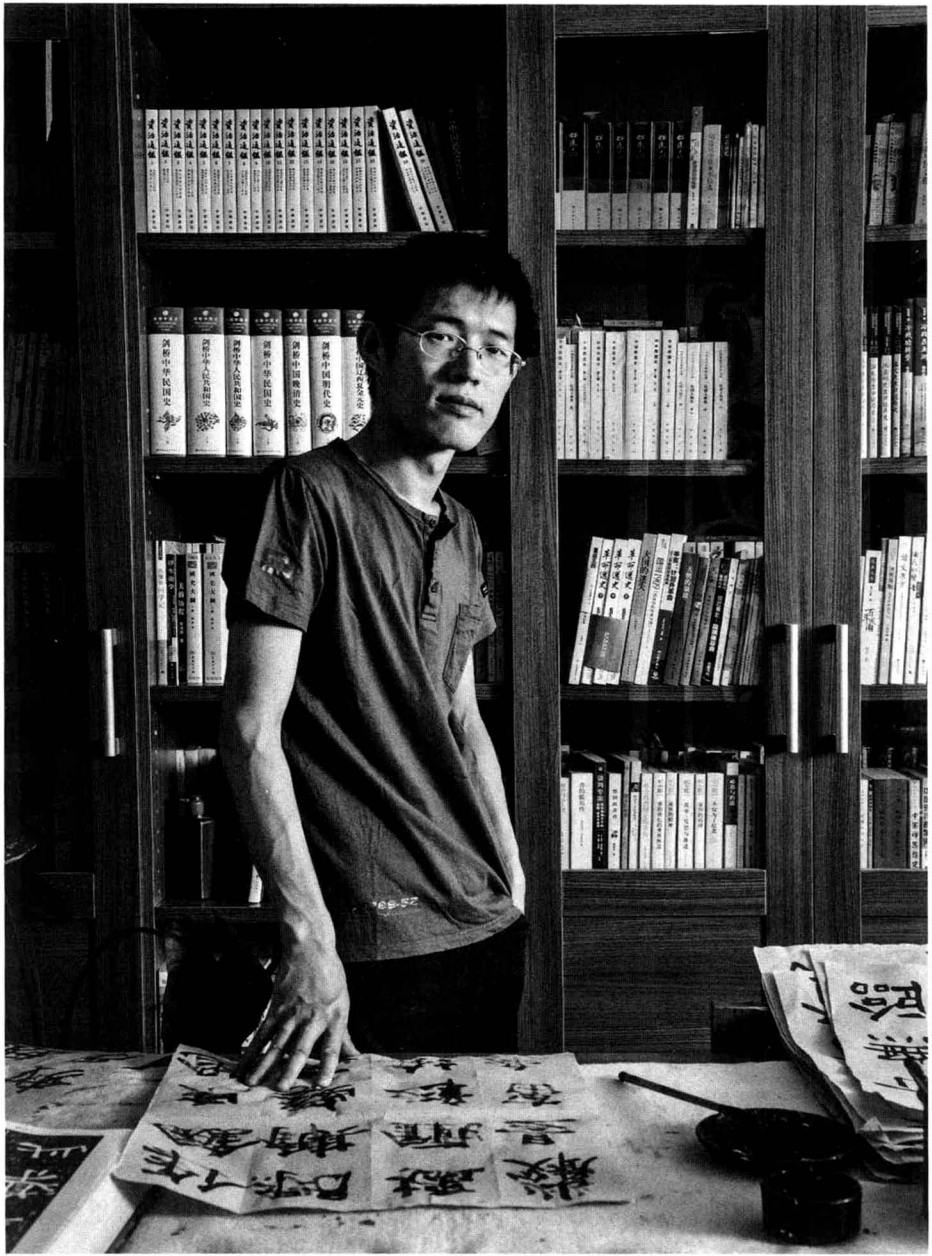
## 陈远：做学问是为解答自己的疑惑

采访、撰文：方可成

在接受各类访谈以及撰写各类著述时，陈远频繁提及几位历史学家的名字。其中一位是法国人马克·布洛赫（Marc Bloch），“年鉴学派”创始人之一。布洛赫的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是陈远的枕边书，他已经翻了不下二十遍。按照布洛赫本人的说法，这本书“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”。非历史学专业科班出身的陈远，特别重视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学习，他家中仅研究方法的书就塞满了一整个书架。

藏在研究方法背后的，实质上是一整套思想体系。正如布洛赫的经典断言，“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”，“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”，陈远在访谈中也屡屡提及“理解”和“不急于下判断”的重要性。他尤其警惕道德判断：“用道德来评价古人，是件残酷的事”，“单单凭借人文关怀的支撑去研究历史，和过去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范式没有什么区别”。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李宗吾、燕京大学等一系列研究对象的分析。他不断试图寻找新的史料，建立新的理解方式，推翻此前的印象。

另几位被频繁提及的是华人学者：余英时、许倬云、李泽厚。陈远说，他



陈远，1978年生。现为搜狐历史频道主编。研究方向为民国史、大学史。著有《被忽略的大师：李宗吾新传》、《负伤的知识人》、《逝去的大学》、《燕京大学1919—1952》等。

与这些学者“隔代亲”，这几位可以被称为“大师”的学者都给予他很多帮助。能够与他们结识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陈远的媒体人身份——这也是陈远与本次入选青年历史学者名单的大多数学者不同的地方。他说，学院派有他难以企及之处，但媒体人的身份和经历也给了他特殊的优势——懂得如何面向公众表达。

不过，比起面向公众表达，陈远还是更享受独自爬梳史料、推翻此前结论的过程。他说，前者是为了别人，后者才是真正为了自己。而做学问，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。

东方历史评论（以下简称“东”）：你的历史研究之路是怎么开始的，是什么样的因素引导你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？

陈远（以下简称“陈”）：你可能知道，我是学理工科的，但我对理工科不感兴趣，只是家里人觉得学文科比较“危险”——我的祖父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双重反革命，他们那一代人对文科天然有一种余悸，在他们看来，工科至少让我衣食无忧，又没有什么风险。但是兴趣是没法阻挡的。我在石家庄的一个工科大学读大学，课堂我要么不去，躲在宿舍中看书，要么抱一大堆老师认为不务正业的闲书去。

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是天然的。小时候，父辈会经常跟我们讲“爸爸小时候怎么怎么样”，我们的祖辈会讲“爷爷小时候怎么怎么样”，到我这个年纪偶尔也会跟我女儿说“你看爸爸小时候是怎么怎么样”。这是一种无意识，慢慢积累成这个民族对历史的一种潜意识。

东：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吗？还是全世界人都会有的潜意识？

陈：我觉得全世界都有，但中国有它的独特性。西方是有宗教的，他们可以在信仰中获得力量，而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没有信仰的。我有一种说法，这种说法也越来越有共识，那就是：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。人们是在历史中获得力量的。这方面例子很多，比如我们经常说的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”，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”，这就是历史的力量。历史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的约束和规范，人们沿着这个规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

我们经常会说以史为鉴，实际上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，尽管它有一定道理。人们希望在历史中寻找智慧。不单单是东方，西方人也是如此，比如布洛赫就讲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们的利益。人们在现实中碰到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习惯回头看。但是历史就是历史，简单说以史为鉴是把历史附庸化工具化了，越是这样，反倒越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。相反，只有先把历史当历史，尊重历史研究自身的规律和范式，才能更好地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。

东：除了这种天然的对历史的兴趣，你的经历中是否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？

陈：我从小对家族的历史就非常感兴趣，因为我爷爷和我大爷爷两个人的人生都非常传奇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大爷爷做到全国政协委员，而我爷爷却深陷囹圄。不过家族里对这些事情都不谈，我都是听村子里其他的老人讲起。在我懂事以后，很长时间里对我大爷爷不能释怀：你身居高位，你的弟弟深陷囹圄，你一句话就可以令他获得解脱，但是你却一声不吭。在我爷爷晚年时，我问他：你们兄弟感情这么好，你在受难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不理不问？我爷爷说，你年纪太小，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，也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，大人的事情你们小孩最好不要问。但是，他越是这样讳莫如深，我反倒对家族的历史越感兴趣。

其实和家族的历史关联最大的就是中共党史，因为1949年以来国人的命运跟中共党史是紧密相关的。但是，像我这样一个在体制外的人要想从党史切入做历史，难度非常大，不可能接触到很多一手材料，而且确实有风险，做了研究也发不出来，别人没法看到你的成果。于是沿着这个路径再向前追溯，就到了民国。正好我上大学时还有一本书对我影响也非常大，那就是谢泳先生的《逝去的年代——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》。我读了之后有很多感想，我觉得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和我祖父的遭遇实际是有某种关联的。一方面，他们的成就令人仰望；另一方面，他们的遭遇也让人叹息。我就开始从知识分子入手，这是我一开始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着力最多的方向。

东：你刚才提到的家族史问题，后来找到解答了吗？

陈：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。实际上后来我是有所规避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，如果研究自己的家族，难以摆脱情感因素，那么所做的分析和呈现就难免有所偏颇。所以后来我对这个问题也不再很执著，但是它对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

东：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，你后来进入了思想史领域。

陈：对，其实我在思想史上的研究和作品非常少，因为做了一段思想史以后，我就感觉思想史过于单薄。我希望从思想史入手，进入到历史的更深层面。材料看多了，我发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理念所主导的，而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。历史的发展真的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它就是势力博弈。历史是势所以至，而不是理所以至。

东：这种观点会不会绝对化了？

陈：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思路可能有关系。在历史研究中，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，但是我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，而且我也希望自己的写作传播到大众领域，这让我会比较自觉地克制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。

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于时代存在，毛时代有毛时代的价值判断，邓时代有邓时代的价值判断，我们今天有今天的价值判断。这个价值判断再过五十年，再过一百年，可能又会发生变化。就像我们今天看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时，很多人会说胡适的学问很粗浅。他们为什么觉得胡适的学问很粗浅？因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，一代有一代之思想，胡适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，开风气之先，你只有把他放在他的环境下看，才能看出胡适的伟大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胡适的学术有简陋的地方，但是不应该否认胡适的伟大。

思想和学术都会因时代而变，我个人的野心是希望自己的东西可以存留得久一点。不敢有超越时代的妄想，但是希望能久一点，比如说我的东西十年以后看可以不过时，我就很知足，这也是我比较克制自己价值判断的一个原因。

东：你刚才说历史是势所以至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但其实在历史中也有很多的偶然元素在左右具体的历史事件走向，你怎么看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？

陈：其实历史事件单个来看都是偶然的，都没有必然性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：



清华大学的建立，就是梁诚会见美国公使，美国公使无意中说到一句庚子赔款确实太多了，梁诚就去争取拿这个钱办了清华大学。但是当我们后来的研究者站在全局观的角度，看到更多的材料，信息掌握得更全面，把所有的事情关联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发现历史有一个必然性。比如说晚清之后为什么是袁世凯，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应该是他，为什么是他呢？我们将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分析，确实非袁莫属，没有人可以代替袁，这就是必然性。

东：你认为这一代历史学者和上一代历史学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能否谈谈你的研究传承？

陈：从我个人来讲，总结三个字：隔辈亲。我跟长我两代的学者无论从情感上，还是从治学方法上、治学旨趣上都更为接近，比如余英时先生、许倬云先生，我跟他们请教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隔阂和分歧。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太高，他们可以就着我，他们跟任何人交流都会让对方感觉如沐春风，这是他们的层次和境界。从我的层次来讲，我看他们那一代人著作的时候获益更多，我会揣摩他们的方法，会研究他们的思想路径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阅读过程也更加愉悦。我是比较幸运的，我跟这些老辈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来往，我的新书就是余英时先生做的序，我原来有一本书是许倬云先生做的序，他们对后辈人都非常提携。

东：跟他们的交往是怎么开始的？

陈：我觉得是机缘巧合。我比较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跟老辈人的交往：一切诚念终将相遇。有句话我始终没有当着余先生的面讲过，但是我经常对别人讲：如果有机缘做余先生的小书童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我从余先生身上感受到的一些精神，让我非常敬仰——我觉得余先生做到这个份上，完全可以原地踏步不动了，因为他的成就已经足够高了，但他却不是这样。我如果在美国时间早上7点左右打电话给他，一般得到的答复是他去图书馆了。几次以后，我就知道要在美国时间晚上打电话才能找到他。余先生谦虚，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常人，一切都是靠努力得来的。我心中一直把余先生当做我的榜样。

东：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，你的历史观形成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学习都是通过自己看书、自学而来的吗？